

第三章 改革开放、勤奋奉献 (1979—1992 年)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伟大进程。1979 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我国对外开放由此迈出标志性的一步。当时真是没有想到，这一正确决策会给我们的国家以及我们每一个人都带来如此巨大的变化，我们从此得到了奉献祖国的机遇，也时刻面临着各种不同的挑战，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了。

与父亲的重逢

自从父亲 1948 年离家南下，先在广州教书，后又去了香港，我们就一直没有见过他。开始几年大哥还与他通信，但后来通信无法继续。

没有想到的是，1980 年已经从苏北农村回苏州、在江苏师范学院（后改名为苏州大学）任教的大哥又收到了一封父亲的来信，并且有了一个地址，是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转来的。震惊之余，大哥给父亲写了信，报告了自己和家中的情况，告知父亲：母亲已在前年走了，几个兄妹都健康，也有安定的工作及和睦的小家庭，每家还都有两个孩子。不久父亲又来信让兄妹们各自分别给他写信去。为了让父亲能安心，我们各自给父亲写了信，并表示我们都十分想念他。在父亲确信我们都活着的时候，他和继母决定暑假让我们到香港去会亲。

从春天到暑假，我们忙着办理申请手续，而且亲身体会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大变化，居然一切顺利。苏州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都得到了批准。三哥和我被告知，因为北京申请出境的人多，我们一家二人只能批准一个，考虑到我已经被选拔要去美国做访问学者，我们就决定由三哥去。二哥当时还在苏北，但也得到了批准。

大哥一向是我们的领头羊，他趁着三哥到苏州去的机会，召集大家在老家耦园中照了几张合家欢，包括父亲从未见过的好几个第三代，准备送给父亲。



大哥召集合影留念（我当时没有在苏州）
（自右到左为：二哥钱行，三哥钱逊，大哥钱拙，小妹钱辉，堂姐钱舒秀）

从辉妹写的《咱家的1980》一文中，可以知道兄妹四人与相隔32年的父亲重逢的这一周时间是多么不平凡。

第一天，当他们在拥挤的人群中正要通过红磡火车站门口的铁栏时，竟然有人问道：“是不是钱家兄妹？”问话人的身边有一位穿着长衫的老人，那不正是父亲吗！辉妹写道：“想不到他竟亲自到车站来接我

们，他刚过了他 86 岁的生日呀。原来问话人就是我们的继母，她看过我们的照片，此刻认出了我们。”

然后是那一个星期的日子，辉妹写道：“在香港一周印象最深的就是累。”原来是因为父亲同他们有说不完的话，每天晚上都要谈到深夜两点甚至更晚。“父亲是想把这 32 年里没有机会说的话在一周内都说完。”他希望子女们了解他想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我想他很清楚地知道这 32 年不仅是时间的分隔，更有文化、思想差异的分隔。他希望子女们相信他们的父亲是爱国的，是在为振兴中华民族的文化而努力。

还有一些事给兄妹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次是他们一起在路边等候计程车，有两个年轻女孩走过，忽然站定，向父亲问好并鞠躬，她们解释说曾经听过先生的讲演。可见父亲受到何等敬重！又一次是他们到尖沙咀的半岛酒店喝下午茶，酒店高大明亮，圆柱支撑着穹顶，金碧辉煌，感觉就像是一座宫殿。大堂里安静得近似肃穆，气氛平和而安详，客人不过三成，都很绅士。继母告诉他们，过去香港是英国占领，这半岛酒店绝不让中国人进入，你们的父亲在香港办学卓有成效，后来这里才向中国人开放了。尽管进入半岛酒店的绅士们全都西装革履，父亲去时却总是穿着长衫，带着一个儒者的风采和一个中国人的尊严。辉妹听着不免吃惊，没有想到自己的父亲居然有这么大的影响。在游览香港的虎豹别墅及其园林时，父亲说，你们看看这里，可以知道苏州园林有多么珍贵！苏州园林的人文历史和艺术成就，无与伦比，我在外几十年梦里都想念着它们。

每晚的谈话中，新亚书院是一个重要的话题，那是父亲筚路蓝缕奋斗了 15 年的地方。辉妹写道：“记得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就知道父亲在香港办了一所学校，有人对我们说，他只身一人哪有力量办学校，他

该是接受了特务组织或反动政府的资助吧。”现在父亲告诉我们，办学之初他们真是“手空空，无一物”，租了几间民房，白天是教室，夜里当宿舍，学生没有能力缴学费，教师没有薪金可发，只是父亲和他的同仁们想让青年学生有个学习的地方，让教师有书教，而且学习和教书的目的都是学习如何做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后来他们先后得到了美国耶鲁大学雅礼协会和哈佛大学燕京社的资助，才有了农圃道的校舍，之后又因港英政府择定新亚、崇基、联合三学院组建香港中文大学（简称“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遂成为中文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父亲是中文大学校名的创意提出者，他还提出了应由中国人担任中文大学校长的建议，这一建议也被采纳。父亲在新亚书院加入中文大学半年之后便辞去新亚书院院长之职。1980年的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先生十分敬重父亲，正是他热心牵线搭桥，才帮我们一家人重新建立起联系，离开了中间这个环节是万万不行的。金院长在一天晚上请父亲率我们兄妹共进晚餐，之后就在夜色之中载我们去了新亚书院。夜已浓，山上山下的灯寂静无声，很有点神秘的色彩，小车在山上一座白色的建筑物前停下。原来这里是以父亲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钱穆图书馆。不过逗留了三五分钟，就结束了这次活动。新亚书院，是谜是梦的地方，终于见到了你。

二哥在《怀念父亲钱穆》中写道：“为了避免新闻记者的注意，继母特地把我们的住所安排在一所旅游饭店的高层，父亲患有青光眼，视物模糊，他经常走到我们身边，从近处审视我们每一个人。他的确还把我们当作孩子，每天先自己正襟危坐，然后令我们挨次坐下。他问我们每个人的经历、生活、读什么书，当他知道我们兄妹都是小学、中学、大学教师时，十分高兴，连声说‘很好，很好’。知道十个孙子和外孙都在重点中学和重点大学读书，更是眉开眼笑。”当谈到我们曾遭遇过

的艰难困苦时，他唏嘘地说：“吃点苦没有什么，我希望你们做好一个中国人，用功读书做学问。”他又说：“我对你们也没有尽到责任，尤其对小女儿，总觉得对她很惭愧。”他离家的时候，小妹钱辉只有9岁。这次来香港，父亲和继母对她特别好，辉妹说：“在相处的短短一星期中，父亲还给我们讲中国历史，教导我们做人治学的道理。几乎每晚都要谈到12点以后，有时午睡了，他刚进卧室躺下，忽然又走到我们房间，讲起他刚想到要关照我们的话，他所有的爱、所有的期望，都溢于言表。”

那时候，我们大多还没有照相机，更少有彩色的相片，继母带了一个相机去，照了一些照片，数量不多，弥足珍贵。现在，这些照片依然可以帮助我们回想起那场阔别32年的重逢。



在香港与父亲合影

（自右到左为：二哥，大哥，辉妹，父亲，三哥）

因为我那次没能去香港，加之父亲非常想念堂兄钱伟长，这件美事终究留下了一些遗憾。当时的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先生把弥补这个遗憾看作自己的责任，又做了新的安排。他早在1978年就在新亚书院开办了“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宾四是我父亲的号），除了第一次由父亲主讲外，每年都邀请海内外名家做主讲人。他决定邀请堂兄钱

伟长作为1981年的主讲人，还出主意让我作为钱伟长先生的助手一起去香港。父亲十分满意金院长的安排，这是在首次团聚的半年后又一次赴港。1981年开春，我和伟长哥到达香港时，又出现了父亲和继母站在车站等候我们的情景。当时的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马临、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对我们非常关怀，将我们四人安排住在中文大学宾馆，楼上三间卧室、楼下客厅和餐厅，只供我们一家使用。每天三餐都是我们一家四人在一起吃，其余时间不是在客厅或父亲房间谈话，就是在中文大学校园里散步。伟长哥完成讲演后，在家庭团聚及与父亲的谈话中是主角，我大多是旁听者。继母曾经描述这次会面：“有着共同往事记忆的侄儿，善解人事，也继有父风，会详告叔父家乡的变迁事况，这些是子女无从知晓也难以体贴顾及的”。她也夸奖了我“善言体贴”。她还说父亲的激动和兴奋胜过了前一次。

记得我当时曾高兴地对父亲说：“在这里真像过家庭生活一样。”父亲欣慰地说：“你觉得开心就好。”沉吟半晌后，他又说：“这里怎么能和家相比啊？什么时候你能到我台北家中住一阵就好了。”没想到父亲和我的共同心愿竟在7年多后实现了。

下面是一张我们在香港的留影。可以看到，海湾的景色美极了，我们四人的心情也好极了。我们叔侄和父女虽分隔两地33年不能相见，但亲情是隔不断的。

写到我们家庭的重逢，金耀基先生的恩情是不能忘却的。他与我几乎同龄。1970年以来，即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历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院长（1977—1984）、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讲座教授（1983—）、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2002年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2004年退休。金耀基教授的研究兴趣主要为中国现代化及传统在社会、文化转变中的角色，



与父亲在香港合影

（后排自左至右：钱伟长，钱易；前排自左至右：钱穆，胡美琦）

并对香港 20 世纪后半叶的发展有过很多研究，其中对港英时期政治进行分析的“行政吸纳政治”理论，是相关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他曾获得的学术荣誉有“中央研究院”院士（1994 年）、香港科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1998 年）。1998 年，获中国香港特区政府颁授银紫荆星章。除了学术研究，金耀基教授对社会事务也十分热心，先后担任过香港廉政公署社区研究小组委员会主席、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顾问、香港研究资助局委员。



金耀基先生

上述材料是我从网络中查到的，我印象中的金耀基先生则要比那些给人深刻印象的职务、奖赏和头衔更生动、更难忘。他待人友好、热情，他知识丰富，他谈吐风趣、生动，我们先后见过多次，每次都是他为我们设想和安排一切，自己则默默地站在一旁。因此我始终没把他看作一个院长或校长，却总觉得他是一位值得信赖、值得敬爱的朋友。

赴美任访问学者（1981—198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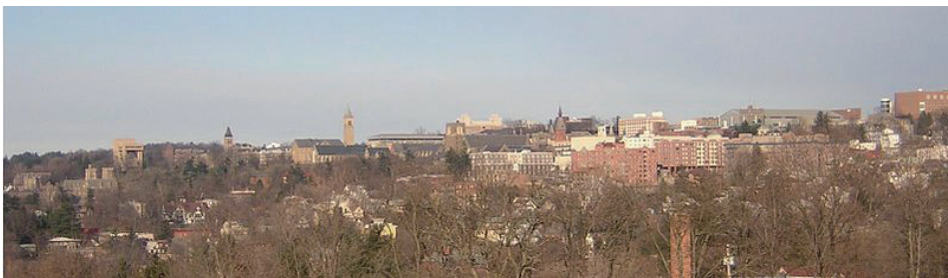
清华大学开始往国外派遣访问学者是1978年，我被通知去参加出国前的英语考试是1979年，听说是陶先生推荐的我，但正式通知我的是当时的党支部书记井文涌老师。我对自己的英语水平很不自信，虽然我曾经参加了当时土木系卢谦教授主讲的一期英语班（卢谦教授是一位语言才能特别强的才子，20世纪50年代时他在土木系开设俄语班，担任俄语翻译，改革开放后他又开设了英语班，听说他还掌握好几种少数民族语言，真是令人钦佩），但当时他主要是指导我们专业英语论文阅读，对我掌握英语语法有很大帮助，而我的英语基础实在很差，我对考试没有把握，记得还是儿子宁鼓励我：“妈妈你能行。”我就决定去试一试了。出人意料，我竟及格了。陶先生又指导我联系学校，最后决定去康奈尔（Cornell）大学土木系。为了适应当时电子计算机迅速发展的形势，我还参加了一个计算机培训班，学习了Basic语言。1980年还与同时考上的蒋展鹏和聂永丰两位同事一起，参加了北京语言学院主办的短期英语集训班，老师是美国Rochester大学的一位教授，专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最喜欢的作家是赵树理。虽然培训班只有一个月，但他对我的帮助太大了，几乎每次上课都要让每个学员开口说话。下课后他很喜欢同我们用中文交谈，我们却不愿意放弃练习英语的机会，因此往往是中英语混杂的谈话。

出国前还有一件对我影响很大的事，那是1980年美国堪萨斯大学的McKinney教授来华讲学，国内多所高校从事卫生工程的教师汇集在同济大学，听这位教授讲“废水生物处理的新发展”。当时我们这一代人的英语水平都不行，胡家骏和李善道这两位年过六十的教授为我们做

翻译，我心里大为不忍，但自己只能听懂 30%，不敢也不能上去代劳。美国教授的讲课对我们真如久旱遇甘霖，对我们帮助太大了。后来我去美国时曾去他家访问，他又给了我帮助。

我是 1981 年 7 月去美国的，忠祥接下了家庭的重任，当时宁儿正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宇儿在北京四中读高一。我是先飞到纽约，然后乘坐汽车去到伊萨卡（Ithaca）。先到那里的中国访问学者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包括找房子、介绍情况、带我去超市买东西，等等。起初我见了美国人说的第一句话往往是：“对不起，我的英语说不好。”他们往往回答我：“你的英语不错，至少比我的中国话好，我还会说中国话呢。”这马上使我鼓起了勇气。

伊萨卡是位于纽约西南的一座山边小城，康奈尔大学占了小城的绝大部分，大学校园的南部是一个小镇。我们就住在镇上的民居中。每天从镇上往学校走，就像在爬山路一样，校园南北有两条从东到西的峡谷，平时可见到溪流淙淙，大雨过后则形成奔腾汹涌的瀑布和激流，两种不同的景象都深深打动了我。



康奈尔（Cornell）大学远景

我很快与土木系的 Dick 教授见了面，他将我安排在来自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的何保康老师的办公室里，给了我一张书桌、一台计算机、一部电话，已经远远超过我的想象了。两年的业务工作安排是 Dick 教授与

我共同讨论决定的，他的主要研究兴趣在污泥流变学，我却偏重废水的生物处理。他建议将我们二人的兴趣和特长结合起来，研究生物处理工艺运行特性对产生的污泥流变学特性的影响，我十分赞同，因此生物处理反应器的设计和运行参数的确定主要由我负责，他则帮助我学习和掌握污泥流变学的研究方法。他安排了一男一女两名硕士生与我共同工作，我和他们几乎全天都在实验室里忙碌。那个女孩子喜欢讲话，她对中国的一切都感兴趣，什么都要问，因此使我得到了锻炼口语的机会，她甚至称呼我为“中国妈妈”。我们的实验进行了一年左右，然后写出了论文，当然是我先起草，再由 Dick 教授修改润色。应该说，我们的合作不错，只是 Dick 教授个性严肃，我到他办公室去找他时他会马上起立让座，他有事到我办公室来也总是站着，我也只好站着同他说话。我们生活中的交往很少。

我与其他教授也有一些接触。一位教授是农学院的，研究天然条件下的废水生物处理系统，特别是在土地处理系统方面很有成就，我通过文献阅读知道了他，就冒昧地前去拜访，他说还是第一次见到来自中国的同行，谈得十分投机。我深深地感到土地处理系统和氧化塘系统对于中国十分有用，应该因地制宜地采用，既可利用废水于农业，又可消除污染。

何保康的合作教授名 Pekoz，是钢结构专家。他夫人当时为中国访问学者和留学生们开设了英语课，我也参加了。记得她上课时要求我们每人作自我介绍，不仅介绍自己，还要介绍家庭。当我讲到我有两个儿子，分别在大学和中学上学时，她惊呼起来：“这怎么可能？”后来我才觉悟到，她其实是非常“聪明”的，按照西方文化，他们不能直接打听别人的年龄，但她又十分好奇，因此她就利用了老师的身份对我们进行调